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河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籍贯与流动：

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宋燕鹏 著



JIGUAN YU LIUDONG

BEICHAOWENSHI DE LISHIDILIXUEYANJIU

河北大学出版社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河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 历史地理学研究

宋燕鹏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宋燕鹏
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1097-935-1

I. ①籍… II. ①宋… III. ①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北朝时代②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北朝时代 IV.
①K928.639.2②I209.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3097 号

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作 者 宋燕鹏

责任编辑 贾道民

封面设计 王占梅

责任印制 蔡进建

出 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印 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3.75

书 号 ISBN 978-7-81097-935-1

定 价 48.00 元

序

宋燕鹏同志《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完成后，希望我来作序。按起来说，我作序并不合适。就学术出身而言，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做过研究生，业师唐长孺先生又是该领域的大家，与本书研究的对象北朝文士的确有所关联。但是，我在校期间确定的专业是隋唐史与吐鲁番文书研究，侧重点又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因此读书的精力主要放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隋唐史方面，毕业之后也长期固守一隅，极少涉足魏晋南北朝史，这个领域着实是我的软肋。这就是我说作序不合适的基本理由。如果一定要找出理由的话，那恐怕只有一个：我生活在曾是北朝核心地带的河北地区，出生在曾经做过北朝帝都之一邺城的咫尺之地——邯郸。如此而已。不过，既然推辞不获，也就只好勉为其难。

通读完燕鹏同志的新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研究理路新。一般来说，史学研究获得成功的作品，其路径不外乎三条，或以理路取胜，或以方法取胜，或以材料取胜（当然，也有兼擅其中两点或三点者）。燕鹏同志新著无疑属于理路取胜的一类。诚如他自言，本书“没有使用什么新材料，只能勉强属于‘新视野’，也可以贴近一点儿新方法”。这里所谓的“新视野”，我的理解就是

“新理路”。这句话去掉自谦的成分，可以看出他的自我归类不出“理路取胜”和“方法取胜”两个范畴。

本书的理路新主要体现在通过北朝的“文士”来研究北朝的文学史。虽说文史不分家，但严格说来本书的研究对象还是属于文学史的范围。我们知道，历来文学史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作家作品来建构某一时代文学史的体系，如果某一时代作家作品太少，则建构体系往往无从下手或建构的体系过于单薄。北朝文学史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学者着手北朝文学史研究，素来痛感于作家作品早已大量散失，传世作品太少，史料严重缺乏。无米之炊带来的后果必然导致对北朝文学地位的评价偏低，长时间内学者普遍认为北朝处于文学发展的低谷期，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描述，要么忽略不计，要么重点代替一般（主要限于少数知名作家作品的研究，例如北朝本土作家多限于“北地三才”温子昇、魏收和邢子才等和民歌研究，由南入北流寓作家多限于庾信、王褒、颜之推等）。那么，除了作家作品之外，还有没有研究北朝文学的路径呢？有！这就是燕鹏同志独辟蹊径，开掘出来并加以放大的研究新理路，即：通过归纳、研究作家主体、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文士“静态籍贯的分布以及动态的流动”，来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从而绕开了一个因当时作品早已大量散失或许永远不可能再现而导致的无法解开的死结。这一新的研究理路未必胜过原来从作家作品出发建构文学史的传统路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它是在原有路径之外的新开拓。

第二个感受是视野覆盖全。从纵向时间看，本书除了将通常意义上的北朝，即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历史全部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外，还做了一些适当上溯和下延。上溯是将十六国时期纳入到了北朝，下延是将隋初即隋朝建立至公元589年灭南陈



纳入到了北朝。从横向空间看，本书除了将北朝势力所及空间都纳入研究范围之外，又在北朝各代之下划分为河东、河北、河淮、关陇、河西、辽东等若干分区，有的还在分区之下再划分为若干小区（如北魏河北区文士之下又划分出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河间邢氏、勃海诸氏、广平诸氏等），以便进行分区比较研究。这样就从纵横两个方面将扩大了北朝文士全部囊括到了研究视野，再加上辅之以《十六国文士籍贯考表》、《北魏文士籍贯一览表》、《东魏文士籍贯分布一览表》、《北齐“待诏文林馆”文士一览表》、《西魏北周文士籍贯一览表》、《隋初文士籍贯一览表》和《北魏洛阳文士转移目的地一览表》、《东魏主要文士地理转移表》、《西魏文士入关时间及任职地点一览表》、《北周“麟趾学士”一览表》、《隋初文士地理转移一览表》等图表，就将各代所见于史籍和碑刻的文士籍贯情况、流寓情况全部列出图表，实现了研究对象文士主要信息的全覆盖。这种覆盖式研究相较于以往的列举式研究，所得出的全景式描绘和结论无疑更为条理清晰和更具说服力。而且，本书还将数量统计图表法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有关文士的主要信息都通过图表一一列出。这些图表因为汇集的资料丰富而相对完整，所有史籍、碑刻能够见到的文士都纳入其中，几近网罗无遗，所以它还具有北朝文士基础性资料汇编和文士人名索引等工具书的性质作用，极有利于读者的查找、验证、引用和使用。这应该是该书的非常可贵之处。

当然，我说该书主要以思路取胜，并非说作者一点考证功夫也没有，作者的考证功夫在书中还是有所体现的，这可以从作者有关北齐文林馆设置时间的考证上得到体现。文林馆是北齐后主高纬时期设立的一个以文人学士为主体的著述机构，曾在南北朝后期产生广泛的影响。关于文林馆设置的时间，《北史》卷八《齐

本纪下·后主纪》称置于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二月丙午，《资治通鉴》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公元573年）二月丙午条所记同。后人立论，多以此为据。上世纪90年代有钟涛《梁季入北文人述略》一文（《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曾据《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一语指出文林馆设置时间应是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但可惜所论过于简略。本书则从与文林馆设置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关系入手，利用大量史料包括新出墓志进行比勘印证，得出了“修撰《御览》是在设置文林馆之后”、“文林馆设置时间是在祖珽任尚书左仆射与斛律光被杀之间”、“魏收去世时间当在文林馆设置之后”和“‘待诏文林馆’封孝琰死在武平三年”四点认识，从而使文林馆置于武平三年二月而非武平四年二月的立论确凿无疑，堪称不刊之论。此外，像作为全书附录的《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意义》一文对西魏北周的麟趾殿和东魏北齐的麟趾阁所做的区分，指出有的学者误将东魏在麟趾阁所编纂的《麟趾格》与西魏北周在麟趾殿所编纂的《世谱》混为一谈等，都是值得肯定的考证亮点。

总之，在燕鹏同志新著即将出版之际，附缀数语，聊以志贺，未敢称序。

孙继民

2011年4月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6)

上编：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研究

第一章 十六国文士的籍贯分布	(12)
第一节 十六国文士籍贯考表	(13)
第二节 十六国文士的籍贯分布	(19)
第二章 北魏文士的籍贯分布	(55)
第一节 北魏文士籍贯考表	(56)
第二节 北魏文士的籍贯分布	(66)
第三章 东魏北齐文士的籍贯分布	(150)
第一节 东魏文士的籍贯分布	(150)
第二节 北齐文士的籍贯分布	(173)
第四章 西魏北周文士的籍贯分布	(190)



第一节 西魏北周文士籍贯考表	(191)
第二节 西魏北周文士的籍贯分布	(195)
第五章 隋初文士的籍贯分布	(231)
第一节 隋初文士籍贯考表	(232)
第二节 隋初文士的籍贯分布	(236)

下编：北朝文士的地理流动研究

第六章 乱世求存：十六国文士的地理流动	(269)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文士集中地的变化	(270)
第二节 十六国文士流动的原因及影响	(277)
第七章 齐聚京华：北魏统一与文士向都城的集中	(285)
第一节 北魏文士向平城的集中	(286)
第二节 北魏文士向洛阳的集中	(295)
第八章 邺城内外：东魏北齐文士的流动与邺下文坛的形成	(328)
第一节 从洛阳到邺下：东魏北齐文士向邺城的集中 ...	(328)
第二节 梁末文士的北上邺城及其命运	(342)
第九章 长安之春：西魏隋初文士的流动与长安文坛的形成	(354)
第一节 西魏文士的地理流动	(355)
附：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意义	(374)
第二节 隋初文士的地理流动	(382)
历史学视野下的北朝文学影像（代结语）	(403)
征引文献	(407)
后记	(425)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个时代自有其时代之文学，亦自有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十六国始，因战乱频仍，曹魏西晋的文学传统在南方延续，而北方文学则陷入低谷。此即“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① 唐人的这段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十六国时期应用型的“章奏符檄”大行其道，而纯文学的“体物缘情”之作则寥寥可数。这不是文士才能的优劣的表现，而是当时形势的必然结果，道出了十六国文学沉寂的主要因素。

北魏建立后，政治稳定使文学风气逐渐恢复，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达到北朝第一个高潮。南方文士的北上，使得南北文学得到初步的交流。以“北地三才”为代表的北方本土文士在这样的

^① 《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43页。《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盖文学之发展除了其本身内部之因素外，与其所处之时代环境也密切相关，故论及北朝文学发展时，亦不外乎此。

大环境中逐步成长。北齐、北周、陈三国对峙时，邺城、长安和建康是三个文学中心。陈朝文学已经失去生气；^① 北周因庾信、王褒等梁代文士的北上带动起社会的文学潮流，但是本土文士成就并不是很高；北齐在继承北魏大部分文学成果之后，吸收了梁代文学新的成果，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薛道衡、卢道邻、李德林为代表的北方本土文士，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成为隋朝初年文士的杰出代表。

而中国自古南方与北方文化就有不同，南北朝时期因政权对峙，致使原本就存在的差异愈加明显。^② 相比之下，从十六国开始南朝文学沿着魏晋文学发展的轨迹继续演变，而北方本土文学经历了陷入低谷到恢复繁荣的发展过程。北方本土文学吸收了南方文学的长处，这种融合给隋唐文学带来重大影响。历来论北朝北土作家，多是“北地三才”，而忽视了北魏建立以来北方本土文化的逐渐积聚，以及北魏洛阳时期社会对文学的推崇和文学风气的广泛盛行，而这是“三才”赖以成长和成名的环境因素。如果没有众多文士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三才”的出现，更遑论隋初来自北齐的“北地三杰”，而文士的地理分布对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 世纪以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大多依赖于正史中

① 曹道衡先生认为南朝的文学事业入陈后都已经衰颓，有下列诸原因：其一是大批有才能的文士北上，其二是南方士族缺乏社会实践，其三是侯景之乱中大批有文化素养的家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见氏著《中古文史丛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73～182 页。

② 唐长孺先生认为南北朝社会经济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在学术领域也有南学与北学的差异，并且学术差异有明显的地理分野，这主要是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54、225～240 页）时至今日，南北地域差异在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所造成的不同依然非常明显。

个别作家的传记，以及《艺文志》、《文苑传》等史料，再加上《经籍志》、《音乐志》等相关记载。而北朝史料严重缺乏，北朝作家作品也已大量散失，由此带来北朝文学地位难以定位等问题。长期以来学者普遍认为北朝处于文学发展的低谷期，因而对于其评价不是忽略不计就是挑选几个重点一带而过，^① 这使北朝文学研究长时期处于沉寂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学者开始对北朝文学进行专题性研究，但多集中在个案研究和民歌研究上。90 年代以来北朝文学逐渐升温，二十年间国内北朝文学的研究与此前的研究相比较，相对出现了一个比较兴盛的局面，^② 但也表现出一些不足。如主要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比较充分，系统研究、整体研究尚嫌不足。北朝文学研究中对由南入北作家研究比重较大，而对北朝本土作家创作文学之研究相对薄弱。以往的整体研究都在作历史的线形研究，时空结合的多维研究则相对较少。

本课题所研究的是北朝文士这一个群体的地理分布，更确切

① 认为北朝文学远不如南朝文学者，多在论述时将北朝文学忽略不计，如刘师培先生在民国六年（1917 年）所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于“魏晋文学之变迁”，接着叙述“宋齐梁陈文学概略”，对于北朝文学未有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者则更多，此为学界熟知，不赘举。几乎各断代文学史著作均认为北朝除“北地三才”和庾信、王褒外，没有高水平的作家。其实是那一时代作家作品散失给我们带来的错觉。我们应以唐初史学家对他们的认识为出发点，而不应以现代眼光审视。

② 代表性的有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二十七章之中，有十章与北朝文学相关，并给予北朝文学相当不错的评价。之后有吴先宁《北朝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与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等专著，将讨论焦点集中于北朝。相比南朝文学的研究，北朝文学研究之风方兴未艾。自然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北朝仍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领域。



的应该是关于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与地理流动的研究。^①也就是说本课题从两个方面考察北朝的文士，一个是从文士的籍贯考察，这是“静态”的一面；另一方面是从文士的流动考察，这是“动态”的一面。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才能充分展示当时文士本身对文学风貌的影响。本课题试图打破以往研究北朝文学的固定程序，从地域视角出发，探讨北朝时期文士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变迁，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历史过程中文学的地域分布规律，是文学与地理学相交叉的综合研究。^②

何谓“文士”？现在一般认为是能文之士。该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之别无关，强调的不是阶层属性，而是自身的文

① 此群体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人群”（Crowd）而不是群体（Group），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一点点组织（Organization）。但他们个人之间却又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对某些对象共同感兴趣，在某些场合又具有相同或大致相似的情感倾向，所以才有了研究的必要。参见江中柱《北朝文人心态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页。

② 如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文学地理”的研究在近几年逐渐有学者提出，并且身体力行。但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则除了胡阿祥先生之外，涉足者寥寥，因而本课题有部分填补空白的意义。此外，对北朝本土文学地理的系统整体研究对于深化北朝文学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没有使用“文学地理”一词，而是使用文士的历史地理学，则是表明主要研究目标集中在“文士”，而非文学作品上。



学才能。“文士”与“文人”^①是现代学者互用词汇。“文人”一般专指具有很高文才之人，“文士”则不仅专指文才，还意味着另具学问。因此相比之下，“文士”较为宽泛，能够涵盖多数能文之士，并且在北朝后期“文士”已经成为相对固定的个人身份的称呼。^②所以本文使用“文士”一词来指代有学问有文才之人。笔者判定的标准为史书中叙述本传时有诸如“善属文”、“有文才”、

① “文士”一词出现与“文人”的出现时代相差无几。最早所见都是在东汉末年或者是三国初年。先看“文人”。曹丕在《典论》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驎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三国志》卷二一“注引《典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2页。）细绎文意，建安七子称得上文人。“（何）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梁书》卷四九《文学上·何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93页。）何逊是梁代著名的文人，在文学史中有其地位。弱冠举秀才，被范云看到其对策，大加嗟赏。因南朝此时的秀才对策已经不重内容，而重是否有文采。范云所称之“文人”，自然就是文才很高之人，一般人也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

② “文士”则在《三国志》中出现。裴松之在作注时，引用了东晋张隐所作《文士传》，该书所收录之“文士”包括“建安七子”，并且在文才之外，多有其它才能。（参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册，第375～408页。）北齐邢邵“博览坟籍，无不通晓。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吉凶礼仪，公私谘禀，质疑去惑，为世指南。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御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词致宏远，独步当时。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北史》卷四三《邢峦传邢邵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92页。）由此可见，邢邵在学问、文才方面都独步一时，这是北朝“文士”的共同特点。北朝亦将“文士”作为个人身份的称呼。如崔达拏，为北齐重臣崔暹之子，崔暹是博陵崔氏在北齐的代表人物之一，崔达拏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年十三，暹命儒者权会教其说《周易》两字。”（《北史》卷三二《崔挺传附崔暹子达拏》，第1189页。）在周武帝灭北齐后，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文士随驾入长安，其中就有他，可见他还是具备一定文才的。北周末年尉迟迥镇守相州时，以他为长史，史书直云“达拏文士，无筹略”，言外之意是他是“文士”，没有将略。（《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第2213页。）



“涉猎经史”之类的评价，或是史书行文中有诗歌、文赋等记载，抑或是有文集记录，而不以是否现存作品为依据。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

关于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国内现在尚属空白，但是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本课题紧密相关。由于学者学科出身的不同，研究成果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学研究；一部分是文学研究。

1. 历史学研究

自上世纪初开始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兴未艾，至今成果颇丰。与本课题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①，该书第一次将历史地理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不是研究北朝，但是在理论上给予本课题以理论与方法的支持。其它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②、《金明馆丛稿初编》^③全面论述了隋唐制度的渊源，深刻揭示了南北朝后期制度发展的脉络。周一良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④、《魏晋南北朝史札记》^⑤、《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⑥，其中多篇论文对本课题都有帮助。唐长孺先生著有《魏晋

①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③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④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⑥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南北朝史论丛》^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③、《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④，其中论述魏晋南北朝士族、孝文帝改革、北朝文化的文章对本课题帮助甚大，尤其是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⑤，从宏观上勾勒出3~9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转型，极具理论价值。万绳楠先生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为本课题提供了宏观的文化史支持；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⑥，则初步涉及到文士的地理迁移对文化的影响，但并未对东魏北齐文士和北周文士有所专论。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⑦其中花大量笔墨论述了六世纪时期北朝的政治变化。张承宗《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⑧则给予本课题以时代民俗的支持。除了大陆学者的研究之外，台湾学者的论著也对本课题有帮助，如毛汉光，他的两部论文集《中国中古社会史论》^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⑩其中论述北朝的政治集团、东西魏对河东的争夺、士族的转移等对本课题的帮助很大。

2. 文学研究

对北朝文学研究用力最深的当属曹道衡，他在《南朝文学与

①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②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④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⑥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⑦ 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

⑧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⑨ 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⑩ 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北朝文学研究》^①、《中古文学史料丛考》^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③、《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④、《中古文史丛稿》^⑤等论文集中多次论述到北朝文学，并且注意到政治、社会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对本课题颇具指导意义。周建江《北朝文学史》^⑥是第一部专论北朝文学的专著，构架了北朝文学的整体框架，但是论述着眼于文本解读，对该时期文学的主体——文士的关注不够，致使论述显得单薄。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⑦中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对各代论述不够全面严整，尤其对北朝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王钟陵《中国中古诗学史》^⑧框架宏大，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对北朝文士的作品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同样遗憾的是对文士群体关注不够；葛晓音《八代诗史》^⑨也存在这样的缺憾。胡大雷《中古文人集团》^⑩则对北齐邺下集团有所阐述，但是未能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深入阐述。对北朝文学作进一步分析的有吴先宁《北朝文学特质与文学进程》^⑪，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⑫，两部博士论文先后从社会政治的背景对北朝文学的变化作了分析，并且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关照，但是对文士的地理流动对文学的影响则分析不

①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⑥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⑦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⑨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⑩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⑪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

⑫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